

邓小平和陈云对“大跃进”的认识

张金才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摘要:邓小平和陈云对“大跃进”认识的相同点为:他们都希望我国工农业生产和建设发展得快一些,但又认为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他们起初都是从积极的方面看待和支持“大跃进”的,后来看到“大跃进”运动中出现一些“左”的错误,思想认识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不同点为“大跃进”运动之初,邓小平表现比较积极,而陈云则相对冷静;对于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邓小平是没有反对,而陈云是没有说话;邓小平后来多次谈到“大跃进”并进行反思,而陈云则很少谈及“大跃进”。邓小平和陈云对“大跃进”的认识存在不同点,其原因是:他们在“大跃进”运动中承担的 leadership 责任不同;领导经济工作的思路不同;工作经历和在党中央的领导分工不同。

关键词:邓小平;陈云“大跃进”;认识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05X(2018)03-0096-07

Deng Xiao - ping and Chen Yun 's Understan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ZHANG Jin - cai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Deng Xiao - ping and Chen Yun 's understan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re like following: They all hope that China 's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will develop more quickly ,but they believe that the spee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not go against the objective law. They initially looked at and supporte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from a positive perspective ,and later saw some “left” mistakes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vement ,and great changes in their thinking and understanding occurred. The differences are like follow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vement ,Deng Xiao - ping was more active ,while Chen Yun was relatively cool; For Mao Ze - dong 's “great leap forward” ,Deng Xiao - ping did not oppose ,and Chen Yun did not speak; Deng Xiao - ping later talked about “great leap forward” and reflection ,while Chen Yun rarely talked about “great leap forward”. Deng Xiao - ping and Chen Yun differ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reason is that they have different leadership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vement; their ways of leading economic work are different; their work experience and the division in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re different.

Key words: Deng Xiao - ping; Chen Yu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understanding

从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是新中国历史上一场以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片面地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为主要特征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重大

损失。处在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第一线的邓小平和陈云,经历了“大跃进”运动的兴起、纠正“左”的错误以及庐山会议后继续“大跃进”的各个阶段,参与了其中许多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他们两人对“大跃进”是怎样认识的?

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不同点的原因又是什么?研究这些问题,对于深化和拓展邓小平、陈云生平思想研究,并从这个角度认识“大跃进”运动,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和陈云对“大跃进”认识的相同点

对于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邓小平和陈云的认识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主要有:

第一,他们和毛泽东一样,都希望我国工农业生产和发展得更快一些,并认为“二五”计划的建设客观上有条件比“一五”计划的建设发展得更快一些。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想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这种想法反映了包括邓小平和陈云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及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普遍有一种尽快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面貌的迫切心情。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和人民觉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建设可以更快地发展。1957年“一五”计划超额完成,经济建设取得建国以来最好成绩,这更使党内外许多人认为,今后完全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以比“一五”计划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进行经济建设。邓小平和陈云持有同样的看法。

1957年4月5日,邓小平在甘肃省和兰州市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应当说可以发展快一些。”现在“我们比苏联发展还快,以后更要快一些。”4月8日,他在陕西省和西安市领导干部会议上说“在比较短的时间学会建设,在比较短的时间把我们的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的任务。”9月23日,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又说“要实现纲要(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引者注),没有一股劲,不经常同保守倾向作斗争,是不行的。”1958年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四川省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说“我们这个国家是很有希望的”,“现在我们中国的速度,比如工业每年发展到百分之十几到二十,这速度是资本主义不可想象的”,“我们完全有可能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速度快一些”。这些话,同他上一年在甘肃、陕西等地的几次讲话一样,是倡导和鼓励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还分析了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条件。他说:我们既有苏联经验,也有其他国家的经验,也有我们自己的经验,正确总结这些经验,就有可能搞得快一些。另外,我们有党的领导,有多少年斗争出来的人民。人民政治条件好,革命意志强,团结得好,有一股劲,“这是最根本的”。^①

1958年5月16日,陈云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肯定能比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更高的速度发展。他说:为什么第二个五年

计划的建设速度能够大大地提高呢?“这主要是因为,经过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取得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发挥了劳动人民从来没有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了从去冬以来的生产和建设上的全面跃进的新形势。”陈云接着说:我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不是具备了高速度发展的条件?“根据我现在的认识,我以为是具备了条件。”他说“首先,我们有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是我国建设事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能够以更高速度发展的决定条件。”“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群众路线的方法来进行经济建设,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这些话虽然是在检讨反冒进的氛 围下讲的,带有一定的政治表态色彩,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陈云的真实想法和愿望。7月4日,陈云在西北协作区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同样支持加快发展速度。他提出“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发展速度最快最有希望的地方”;支持“用群众运动群众路线的方法来增产”。^②

第二,处在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第一线的邓小平和陈云都认为,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需要条件,不能违背客观经济规律。

1957年1月,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针对1956年投资规模过大导致的经济不稳定状况,提出“要使生产稳定,就要积蓄一些东西,如粮食、工业原料,包括钢材。没有后备力量,生产就不稳定。积蓄一些力量,生产才能稳定地进行。”在这次会议的闭幕会上,陈云在讲话中表示“这个意见我同意”。在这次会议上,陈云还作了关于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会后,陈云领导的中央经济工作小组决定对当年基本建设规模和速度进行适当调整,继续缓解投资规模过大的紧张局面。邓小平对陈云的主张和中央经济工作小组的决定都是支持的。他还提醒“搞建设并不比搞革命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这方面我们的本领差得很。搞革命不能说我们没有本事,把革命干成功了,总算有本事。搞建设我们还谈不上有多大的本事。”^③

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对于会议作出的把大量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以充分调动地方“大跃进”积极性的决定,邓小平在发言中,一方面指出管理权下放有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另一方面又强调说,管理权

^{①③}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传(1904—1974)》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7、1060—1061、1058页。

^②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1—1142、1148页。

下放后,中央的作用不是没有了,中央要注意做好综合平衡,避免出现混乱局面。他说“中央还有平衡、协调、技术革命等等作用”,“中央要从大量的繁琐的事务中彻底解放出来,抓主要问题,发挥它应起的作用。”4月4日,邓小平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管理权下放要“具体化”,“要开单子”,意即管理权下放到地方要合理有序。陈云赞同邓小平的意见。4月11日,在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75次全体会议讨论国务院各主管工业部门所属企业的下放问题时,陈云在发言中指出“下放的时候要分别轻重缓急”,还说“邓小平同志在成都会议上讲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讲的就是中央要下放,地方要管好”。^①

第三,“大跃进”运动发动后,邓小平和陈云起初都是从积极的方面去看待和支持“大跃进”的。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后,邓小平密集地到各地视察工作,目的是宣传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号召各地为完成党中央提出的战略任务,特别是用剩下的4个月时间实现全年生产1070万吨钢的指标而努力奋斗,用他自己的话说“出去主要是鼓劲。”^②1958年9月中下旬,他到东北视察;10月上中旬,他先后到天津市、河北省视察工作;10月下旬到11月初,他又到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视察工作。在视察过程中,邓小平发表了许多讲话,对各地“大跃进”工作进行具体指导,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予以积极响应。

关于“大跃进”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强调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干。9月24日,他在视察鞍山钢铁厂时指出:社会主义大家都在搞,但是怎样搞,还有个方法问题,是多快好省呢,还是少慢差费。搞什么都要有个攻击目标,应该定出哪一项东西能赶上哪一国,哪一项东西哪国好就超过哪一国。要选择尖端作为攻击目标。别人没有的,我们可以有;别人不好的,我们可以好;别人办不到的,我们要能办到;别人的目标,我们可以超过。要把这一点作为主导思想,作为各级领导人的主导思想。在谈到挖掘潜力增加生产时指出:潜力有两种,一种是改革规章制度,改进作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一种是改进技术,产生新的推动力量,这就是技术革命。后一种潜力更大。鞍钢应大搞技术革命,大企业、现代化企业要自力更生,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但是,技术革命不容易,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首先得敢想,来个思想上的革命。没有思想革命就不可能有技术革命。^③10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石家庄地委和专署负责人汇报工作时进一步指出:农业生产要采取不断革命的精神,要敢想敢做。要善于揭示自然秘密,揭示物质的秘密。只要人的思想解放了,就能更多地掌握科学技术,充分发挥和挖掘物质的力量。^④

关于大炼钢铁,9月22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和长春市委负责人工作汇报时督促说:搞钢铁就是搞共产主义,是战略任务,不能等铁路,搞起来再说。炼铁的技术问题可以组织大学生下去指导。^⑤

关于人民公社,9月25日,邓小平在辽宁盖平县视察太阳升人民公社时谈到:公社应制定长远计划,逐步把农村居民点建成一座座漂亮的城市,有电影院、剧院、运动场,房屋都要改建,城中普遍种花果,要绿化、园林化,工农商学兵全面发展。大城市所有的一切,你们都可以有。将来无所谓农村和城市。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城乡差别,都要消灭。^⑥邓小平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这个设想,明显受到毛泽东和当时社会氛围的影响。

陈云起初也是从积极的方面去看待和支持“大跃进”运动的。一开始,陈云对粮食“高产卫星”的宣传报道虽然没有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但他相信1958年的粮食产量确实比往年增加了,也相信少数试验田是能够高产的。对于北戴河会议确定的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的指标,陈云开始虽然有怀疑,但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定后,他还是努力执行中共中央决定,多方谋划如何去实现这个目标。

8月19日、2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云在北戴河就1958年钢铁生产问题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分析已完成的产量与全年指标相差悬殊的原因,研究用剩下的4个月时间实现全年生产任务的措施。经过会议讨论,陈云提出8条意见:(一)经委的主要注意力是搞生产,工厂党委书记、厂长都要以当年生产为中心。(二)原材料的调配要服从国家的计划,要以1100万吨钢、1700万吨铁作为调配标准。(三)要抓大中型轧钢设备,抓中厚板、薄板和无缝钢管的轧钢机的生产。(四)机械制造工厂的第一投料方向是搞冶金设备,要保证这个重点。(五)对于冶金和机械的生产,各省、市委要每个星期抓一次,冶金部和机械部要两个星期召开一次电话会议。(六)冶金部直属工厂要再多布置50万吨钢的生产,作为今年任务的保险系数。(七)在完成生产任务、调拨材料方面,要讲纪律。(八)在北戴河召开各省、市

^{①②}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传(1904—1974)》下卷,第1068、1083页。

^{③④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5、1460—1461、1455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卷,第145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传(1904—1974)》下卷,第1084页。

工业书记会议。^①这8条意见大部分反映了毛泽东的想法。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当即通过电话传达到各地。

作为对上述8条意见的落实,从8月25日到31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由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管工业的书记参加的工业生产会议。会议在陈云等主持下进行,首要内容是讨论如何加强各级党委对工业生产的领导和检查,加强各方面协作,保证完成1070万吨钢的生产计划。

第四,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发展,邓小平和陈云看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的错误,思想认识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邓小平和陈云起初支持“大跃进”运动,是因为“大跃进”的错误有个逐步发展和暴露的过程,此时人们对它因违反客观规律而将导致的严重后果还缺乏认识。随着运动的发展,邓小平和陈云都看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一些问题。

在大炼钢铁方面,针对全国各地组织大量人力、物力大炼钢铁,造成许多浪费的现象,邓小平在10月25日同中共云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有些地方可以停一些,如没有捞头的,运不出去的,本地又不能用的。”他还说:“小土群”是今年在北戴河会议后突击出来的,“明年的界限是‘小土群’生产不算,钢铁一律要升级。”“土炉炼的钢,质量达不到,明年不算数。”^②

在农业生产方面,邓小平对粮食产量的浮夸风及只顾炼钢、不顾生产的情况提出批评。在9月中下旬的东北视察中,邓小平深入到吉林省永吉县了解农业生产情况。当听说一块水稻试验田亩产可以达到4万斤时,邓小平十分吃惊。他说:能打十分之一,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很高,精神很可贵,但是,指标要实际一些。^③在川北,当邓小平看到男女老少都在大炼钢铁,田野一片空寂时,很不高兴。他对陪同的省、地负责同志说:你们这里农业生产是大失败,大垮台,明年是大减产!群众干劲大,热情高,这很好,但是这种情况,你们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实事求是,保护好群众的积极性。^④

在人民公社方面,邓小平对各地人民公社刮起的“共产风”提出疑问和批评。10月6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公社分配问题时指出:实行供给制,要使群众自己略有调剂,粮食包了,但吃菜,要自己调剂,各家的灶能否取消,还是要研究。现在公社食堂有啥吃啥,社员穿衣也简单,将来生活好了怎么办?统统清一色好不好?南方人的生活是多样性的,吃菜的品种总要多,三样四样。我们到哈尔滨看了一个公社,刚开始搞,到食堂吃饭的人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十几。另一个城市公社,也很少人吃食堂,其他人是来看。为什么大家

不来吃食堂?就是菜搞得太单纯,不合口味。^⑤在10月中旬视察保定地区时,邓小平听到宣传共产主义越多越好的说法时指出:共产主义优越性要宣传,但要说清楚哪些是现今可以办的,哪些是将来可以办的。在谈到分配、奖励等问题时又指出:工资拉平,是平均,不是平等。现在讲各取所需还早着呢。^⑥

陈云对“大跃进”运动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变化过程。起初,他真诚地希望经济落后的中国能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大跃进。但北戴河会议后,国民经济很快陷入严重的混乱和紧张之中,“钢帅升帐”,“一马奔腾,万马齐喑”这是陈云不愿看到的。北戴河会议刚开过一个星期,陈云在商业工作座谈会上就提醒商业部门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不要忘掉自己的主要职责是做好商品流通工作。他说:“商业工作的主要职能是什么?我同意绝大多数同志的说法,商业工作的主要职能是做好商品流通工作。”“商业部门可不可以搞一些工业呢?我同意先念同志所说的意见,商业部门可以在不同地区的一定条件下办些应该办的工业。而且商业部门过去也办了一些工业,如果某一个地方正在掀起全民炼钢铁运动,当地的个别商业单位,像其他机关、学校、居民一样,派出一部分人,参加这个运动而搞了一个炼钢单位,这样做可不可以呢?这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商业单位的主要工作,仍然不是炼钢,而是做商业品流通工作。商业部门不应该把办工业作为主要的工作,而放松商品流通工作;也不应该把搞商品流通工作与办工业看成并重。商业部门的主要职责应该是做好商品流通工作,做好商品流通工作也就是为了发展工业。”^⑦

北戴河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分工,陈云的主要工作是抓全国的基本建设。1958年的基本建设,由于单纯图快、严重违反操作规程和管理混乱,发生了许多工程质量事故,倒塌不少新建的厂房,事故的数量、伤亡的人数都比往年多得多。为了研究解决基本建设工作中出现的这个突出问题,12月22日至26日,陈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97页。

^②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传(1904—1974)》下卷,第1090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四川省委编著《邓小平画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四川省委编著《邓小平画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23页。

^{⑤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卷,第1459、1462页。

^⑦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第3卷,第1074—1075页。

云在杭州主持召开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现场会议,纠正基本建设中片面图快图省而不顾工程质量的倾向。

12月31日,陈云回到北京,将他在杭州现场会上的发言和总结讲话的记录送给邓小平,并在信中说“目前总的趋向是在基建中不适当的片面的节约,只图数量不顾质量。”邓小平非常重视陈云反映的这些问题,立刻将陈云的信和两份材料批转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阅知。第二天,陈云又写信给毛泽东,报告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杭州现场会议的情况。信中直言不讳地说“总起来说,目前的基建情况是只图数量不顾质量,多快省而不讲好,片面的不适当的节约,把不应该破除的规章制度也破除了,只搞群众运动一面而放松了业务上的管理制度和技术管理制度,基建任务很大很急,但基建的工人(新的)和设备都与任务不相称。”^①

1959年1月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请陈云就基建工程管理和工程质量问题讲话。陈云详细谈了基本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基建宁可停工待料也不能马虎。邓小平赞成说“计划不要把钢材打满了”并强调说“数量和质量是大问题”。^②会议同意陈云关于全国基本建设中存在问题和解决的意见,并决定将陈云在杭州现场会议上两个讲话的纪要,批转各地各有关部门及单位依照执行。

二、邓小平和陈云对“大跃进”认识的不同点

邓小平和陈云对于“大跃进”认识的不同点主要有:

第一,“大跃进”运动之初,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其他成员一样,表现也是比较积极的,而陈云则相对冷静一点。

当“大跃进”以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形式兴起后,一时就难以辨别和把握了。邓小平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一样,也开始对“大跃进”持积极乐观的态度。1958年7月2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共中央委员蔡尔斯时说:中国是一个落后国家,想在15年或更短一些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现在看来,这时间可以大大缩短。7月11日,他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又说“现在已经发生这个问题了,粮食多起来了,比如麦子,河南增产最多,河南就发生麦子农民不要,要卖给国家的问题了,国家买不得那么多。”“农业首先发生这个问题。工业是不是会发生这个问题?工业也会发生这个问题。”他还说“六亿人口的这个国家,应该有自己的创造,应该找出更好的办法。”^③邓小平9月中下旬在东北考察时,讲话的调子也主要是鼓劲。

后来,邓小平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曾多次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

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④“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过去几十年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不理想、不大好的经验”“我们都想把事情搞好,想搞快一点,心情太急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就是心情过急。心情是好的,愿望是好的,但心一急,出的主意就容易违反客观规律。”^⑤

陈云在“大跃进”运动发动后,一方面支持加快发展速度,另一方面也保持了较为清醒的头脑,对各地区各部门提出的粮食过高指标和“高产卫星”的宣传报道没有持完全肯定的态度。1958年7月4日,陈云在西北协作区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当时的过高指标提醒道“协作区各省提出的指标数字,我以为需要再充分研究一下它的可靠性”;“计划应该照顾到各产业部门的协调前进,但是可以在先后次序上有所偏重”。^⑥8月15日,陈云在北京会见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希尼亚克。当希尼亚克谈到董必武参加捷共第11次代表大会时介绍过《人民日报》对粮食亩产量的报道,陈云回答说:那样的亩产“是一些试验田,大多数合作社还没有达到这个数字”。^⑦

“大跃进”运动开始后,工业战线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1958年钢产量指标订为1070万吨。这一指标的由来是6月19日毛泽东和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的一次对话。毛泽东问王鹤寿:钢产量“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王鹤寿回答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就布置了。陈云对这样的高指标是有怀疑的。据王鹤寿回忆,对他关于1958年钢产量可以在1957年基础上翻一番的回答,“陈云不以为然,说:你怎么这么轻率!这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⑧此时的陈云不可能脱离“大跃进”浪潮的影响,也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大跃进”的严重失误,但在当时人们头脑普遍发热的情况下,他所持的冷静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①⑦⑧}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第3卷,第1164、1150、1151页。

^{②③}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传(1904—1974)》下卷,第1104、1074—1075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277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1070页。

^⑥《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226页。

第二,对于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邓小平是和刘少奇、周恩来一样没有反对,而陈云是没有说话。

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讲到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看法时说“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①从邓小平的不同措辞中,可以体会出他和陈云对“大跃进”认识上的细微差别。

随着“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的普遍开展,人们的头脑越来越热,并且互相攀比,所提的生产指标越来越高,报刊上也不断宣传粮食“高产卫星”。全国上下这种热气腾腾的局面,使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越来越不摸底,头脑也更热了。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座谈时表示: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三年就行了;赶上美国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7月7日,周恩来在广东省新会县干部会议上也感慨地说:这个大跃进,把我们的思想解放了,这是我们过去所没料到的。^②邓小平也是如此。前述他在会见美中央委员蔡尔斯时的谈话以及他在全中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都反映了他当时对“大跃进”的认识。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时说“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有一些过失,比如‘大跃进’这个事情,当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③在这次对话中,邓小平再次承认自己当年对“大跃进”没有反对,体现了对历史负责的担当精神。事实上,邓小平后来曾对他女儿邓榕说,他很后悔自己没有做出更多的努力,阻止毛泽东犯下这些严重错误。^④

陈云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没有说话,虽然在客观上也是没有反对,但有主观上想反对,而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所以不说话的因而在里边。

陈云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主张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订经济计划必须做好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需和外汇收支的综合平衡,以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健康发展。他认为,只有按比例发展,才能取得最快的速度和最好的效益。

对于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陈云从本意上是有看法的,因为“大跃进”的一些做法和他的一贯主张是相矛盾的。但当“大跃进”开始后,陈云还是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和支持。这既是基于顾全大局,维护中共中央、毛泽东决策的一致性,也是基于保护人民群众的热情。另一方面,陈云是以一个反冒进的检讨者参加到“大跃进”运动中去的,处境本身就比较困难,即使对“大跃进”有

不同意见,在当时的情况下也难以表达。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是从批评反冒进开始的。而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主要是批评周恩来和陈云等。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评综合平衡的思想,批评财经部门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通报情况,批评“天天谈市场,天天谈库存”,显然是批评陈云的。薄一波回忆说,南宁会议“毛主席实际上是批评陈云同志的。由于陈云同志没有到会,总理作了检讨,承担了全部责任。”“随后,毛主席找我、富春和先念三个人谈话,也明确地讲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⑤历时半年多的批评反冒进,不仅带来了“大跃进”,也使党内民主生活开始由正常或比较正常向不正常转变。在这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陈云对“大跃进”的发动自然无法表示反对意见,所以没有说话。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把右倾思想同反冒进联系起来,多次点到反冒进的错误。因此,陈云对会议作出的“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大跃进”的各项决议,不便也不能公开表示不同意见,所以仍然没有说话。

“大跃进”期间,也有人建议陈云出来说话。薛暮桥和宋绍文就希望陈云找毛泽东谈谈他对“大跃进”的一些问题的想法,陈云无可奈何地表示“不吃一点苦头,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⑥从这里,也可以体会出陈云对“大跃进”没有说话的原因。

第三,邓小平后来多次谈到“大跃进”,对“大跃进”进行反思,而陈云则很少谈及“大跃进”。

鉴于“大跃进”运动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的重大损失和严重破坏,邓小平后来多次谈到“大跃进”,指出要汲取历史教训,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在1980年前后主持制定第二个《历史决议》期间,邓小平更是密集地谈到“大跃进”,分析“大跃进”发生失误的原因是经济建设经验不足,头脑发热,违背客观规律,并多次做自我批评。

与此不同,翻遍《陈云文选》和《陈云文集》,很少看到陈云谈及“大跃进”;《陈云年谱》也鲜有陈云论及“大跃进”的记载。即使是在1962年初召开的专门总结“大跃进”以来经验教训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三次请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6页。

②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传(1904—1974)》下卷,第1074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④[美]傅高义著、冯克利译《邓小平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57页。

⑤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第3卷,第1130—1131页。

⑥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

陈云在大会上讲话,陈云也没有讲,是唯一没有在大会上讲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后来回忆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①从这里可以理解陈云很少谈到“大跃进”的原因。

三、邓小平和陈云对“大跃进”认识不同点的原因分析

邓小平和陈云对“大跃进”的认识存在不同点,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们在“大跃进”运动中承担的领导责任不同。

邓小平和陈云虽然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但在“大跃进”运动中他们承担的领导责任不同。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处在领导经济工作的第一线,而陈云为组长的中央财经小组实际上终止了工作。

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时说,国务院财经部门只拿成品,不让中共中央政治局参加设计,实际上是封锁,是搞分散主义。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决定把经济工作决策权从国务院财经部门集中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并在会后进行了领导体制的变动。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中央财经小组由12人组成,陈云为组长,李富春、薄一波、谭震林为副组长。《通知》规定“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②根据上述精神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与此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不同,不再是根据中央决策统一领导国家经济工作的机关。这样一个小组,后来活动日益减少,乃至无形中不再发挥作用。而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则被推到了领导经济工作的第一线。

在1959年4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更是增强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特别是邓小平在领导经济工作方面的权威。毛泽东说,除了讲经济工作领导权集中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之外,还要提出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他说“中央主席是我,常委的主席是我,所以我毛遂自荐为元帅。书记处就是邓小平同志。”“毛泽东为元帅,邓小平为副元帅。”“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人一正一副。”^③可以看出

邓小平在“大跃进”运动中领导责任之重。正是因为邓小平在“大跃进”运动中承担了重要的领导任务,所以他对“大跃进”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的重大损失和严重破坏有更深认识。这就是后来邓小平比陈云更多地谈到“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他们领导经济工作的思路不同。

邓小平在经济工作中一贯主张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能快的就不要慢,有发展条件的就不要阻挡。

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陈云领导经济工作的一贯思路。即使是在“大跃进”高潮中搞经济建设,他同样力求把工作做的符合实际,反对单纯图快而主观蛮干。对工业布局,他提出不要勉强去办那些难以办到的事情。对建设项目排队,他要求保证重点,照顾一般,要对任何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对企业设计,他要求把创造精神和实事求是结合起来。^④“大跃进”运动开始后,速度被看成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被看成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人们的头脑普遍发热,贪多图快而不顾质量和效果。在这样的背景下,陈云能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直率地报告1958年基本建设中存在的只图数量不顾质量、只搞群众运动而放松了业务上的管理制度和技术管理制度、把不应该破除的规章制度也破除了等问题,并把它作为主要的错误倾向来反对,这样冷静的态度在当时“大跃进”的氛围下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他们的工作经历和在党中央的领导分工不同。

邓小平是军事出身。新中国成立前,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带兵打仗。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虽然在主政大西南时领导过财经工作,到中央工作后也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财政部长,但他更长的时间是分管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先是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八大后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而陈云在新中国成立前即主持过边区财经工作和东北财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直到“大跃进”,他一直是中央财经工作领导人,具有丰富的财经工作领导经历和实践经验。这样的工作经历和领导分工,使得邓小平和陈云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自然会有不同的认识。

作者简介:张金才(1968-),男,山东德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汪谦干

^{①②}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第3卷,第1302—1303、1144页。

^③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传(1904—1974)》下卷,第1117页。

^④参见陈云《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人民日报》1959年3月1日。